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中国革命

——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 骆 乾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1939年冬，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就的。该著作于1940年春在《共产党人》发表，新中国成立后，经毛泽东审定编入《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矛盾，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性。

勇于承担——“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革命与运动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它们能够变动社会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与战争却总是被地主贵族利用，不能成功。毛泽东认为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总是失败的原因在于得不到先进阶级与政党的领导。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社会性质与阶级组成发生根本变化。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不是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通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一切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的变成了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 and 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由此，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残余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以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与外国侵略者及封建统治者展开英勇斗争，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都是这种反侵略斗争的例证。毛泽东认为，虽然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已有100年的历史，但革命任务仍没有显著成就，他要求中国共产党要首先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并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行动。

理论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指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发表了对革命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的新见解。重新定义革命动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点睛之处，即以联合和斗争的辩证策略与谨慎的态度，寻求“敌人”和“朋友”之间的阶级联盟。毛泽东认为，虽然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还需具体分析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地主阶级中“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资产阶级与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关系复杂，“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毛泽东在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下对中间阶级作的科学分析和解释，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核心基础。

毛泽东具体解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他认为资产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动力，那么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不是旧式的革命形式，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密切。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包括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两重任务，这都担负在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他还特别指出党内两种错误的观点，“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未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最后，毛泽东得出重要结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二者的关系，才能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那天起就担负了双重革命任务，并为此而奋斗。这样的任务是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崇高理想——“新中国”构想阐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途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层含义，此外还有新民主主义建设论和纲领论，即对未来社会和国家的构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论述了“新中国”的构想。

毛泽东的国家构想可追溯至五四时期，1920年在湖南自治运动影响下，他设想了“湖南共和国”湘人自治方案，虽是一种空想，但激起他开展社会运动的想法。土地革命时期，他又先后产生了工农共和国和人民共

和国构想，他认为人民共和国的内容更广泛，它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1936年，为逼蒋抗日，毛泽东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民主共和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强调国家的统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为回击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纠正党内对革命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开始使用“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口号。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现在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并在青年献旗上书“新中国的火炬”几个字。

“新中国”即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充分解释了“新中国”的含义，“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构想实际上是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随着局势变化，毛泽东的新中国观不断变化和丰富，但实质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毛泽东又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联合政府的设想、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最终确定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新中国的国体。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发展。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新要求，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3期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约请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针对全会提出的相关问题撰文探讨。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统揽“四个伟大”的根本保证，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面对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如何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对此问题，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学新在《深化细化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机制》中予以回答。文章认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关键。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抓紧抓牢管党治党责任，深化细化“四责协同”机制，构建主体明晰、有机协同、层层传导、问责有力的责任落实机制，同心划船、同向发力，用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履责指数”换取群众的“满意指数”。

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当作风，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记于心、反复强调要做好的大事。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仰哲在《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中认为，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当之风摆到更加突出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坚决扛起维护群众利益的政治责任；树立精准思维，找准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着力点；强化政治监督，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创新制度机制，确保问题整改常态长效，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纪检监察工作就在身边、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

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政治监督。实施强有力的政治监督，根本目的是要使全党自觉而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时时刻刻向党中央看齐，确保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办公厅纪检监察组组长苏健勇在《扎实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中就派驻机构如何做好政治监督工作提出建议：一是细化实化政治监督内容，推动政治监督深化发展；二是做细做实政治监督渠道，丰富政治监督方式途径；三是坚持抓早抓小主动预防，保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使监督融入“十四五”建设之中。湘潭大学教授、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吴建雄在《构建全覆盖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中认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坚持党的领导，夯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健全权力监督制度，完善执纪执法体系；加强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夯实高质量监督的基础，以高质量的监督保障推进高质量发展。

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 范丽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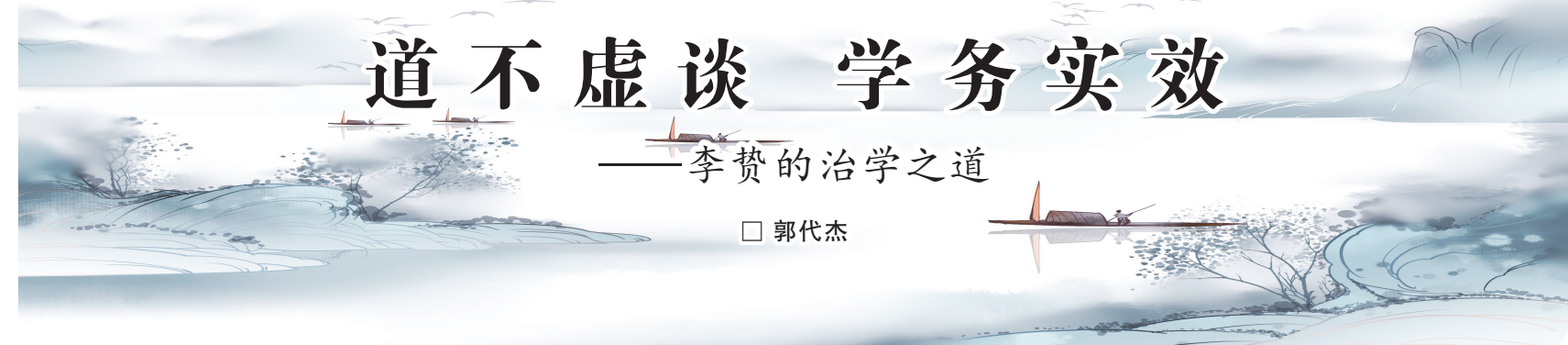
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在《毫不松懈纠治“四风”以新风正气引领新征程》中围绕如何毫不松懈纠治“四风”问题展开论述。文章认为，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进入新发展阶段，作风建设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对党员干部的作风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四风”回潮复燃的风险仍然存在，不正之风不断出现新动向，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整治“四风”问题的复杂性，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精准识别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新表现，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嘉靖三十一年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就任河南辉县教谕。李贽生平博学好古，喜爱读书，深于内典，以批判的眼光和求实的精神，大胆且创造性地抒发己见，完成了《焚书》《藏书》等著作，其中蕴藏着他的读书之法和治学之方。

“学主不欺，志在救世”的治学目的

李贽是一位爱民、正直的士大夫，面对国危民艰、宦官专政的严重现实，他忧国忧民，主张把治学与治世结合起来，所以“志贵适时，学必经世”便成为了他治学的指导思想。李贽认为，“出而治国，则国治；出而平天下，则天下平，便是实学”。他将治学的注意力从“至善”的封建道德原则转向了“治国平天下”的实学角度，把“有为”看作是衡量学问有无用处的尺度。

因此他痛斥闭门读书的“腐儒”，批驳他们只会背诵经典，一心关注科举仕途而不关心国是，同时抨击崇尚空谈的道学家，认为学人不应该学空谈家，而应该是实干家。他认为读书做官应是为了“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万世之平”，但当时的现实却是，满朝高官“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致“临



道不虚谈 学务实效

——李贽的治学之道

□ 郭代杰

时无人可用”，可谓治不思适时，学不能经世，实为伪学。

从学术氛围来看，李贽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当时科举考试科目依然沿袭着唐宋旧制，参加考试的“士子”须撰写“八股”文章，这就造成了“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学风空疏、人才萎靡等弊病。李贽通过自身的遭遇以及和中下层民众的接触中，逐步认识到这种弊病的危害，因而大力提倡“求实”的学风。

他提出：“学须须有些真实受用，不然，只在道理上缠缚，如何了得？”他认为治学与为文，意在有用，不为名高，没有用处的学问，徒有虚名，其实是属于无用的糟粕一类。因此，他在讲学时会将经典与现实生活联系

起来，立足民生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试图将经典生活化、实用化、日用化。

“实学、实行、实说”的治学方法

与李贽提出的“治国平天下”实用之学相联系的，是他的“行不离知”“知不离行”“知行相须”的知行观。李贽有云：“夫当行而后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后言，非深于学者不能。”其中的“当行”“可行”强调的是“行”一字，此为李贽衡量是非的原则。以“行”为准绳，李贽极其反感两种人，一是所谓的“贤者、智者之流”，自我标榜、孤芳自赏；一是不敢尝试，对任何事物都持

拒绝态度的人。这两种人会时时处在“不知不行、不行不知交相瞒”的状态，原因在于“以不行故不得知，不知故不肯行”，就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后果。

李贽强调学问须躬行实践，如在他追寻“道”的过程中，他认为道在百姓日用之“迹言”中，是存在于百姓实际生活中的理论依据，是“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是具体的“各有各必至之事功”的处世之方，绝不是空洞的形而上学。因此既重视理论研究，又基于实践活动，并且能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李贽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知行合一”为治学原则，李贽反对死读书。他指出：一味地从书上去找义理，会“读之而不知其义也”，

且会变成“世上何人不读书，书奴却以读书死”的“书奴”。正如孟子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那么该如何读书呢？李贽称应“洞五脏”“至骨髓”“不避忌讳，切骨而论之”，只有“肌理得分”才能“时出新意”，其文才会“不阡不陌”而“据其胸中之独见”。为了培养这种“信在自立”的精神，他主张“学贵有疑”，认为“学人不疑，是谓大病”。他多次称赞杨慈湖，认为杨慈湖之所以能够不断悟道就因为他善于质疑，“破疑即是悟”。

“自适、自得”的治学境界

李贽在学术上的批判和独创精

神，使得他的为学境界是在追求“自适”“自得”的洒脱。李贽治学追求的境界是“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是获得精神的享受，而并非是借着“学而优则仕”这块敲门砖“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因此，李贽提出“有些骨头者，方可学道”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读书人在为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完善个人的智慧才能，还要实现人格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达到“识、才、胆”三者俱全。在李贽的眼中，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是“大人”“底人者”，为人高风亮节，行不苟合，立身于世却不依赖他人；依草附木的人是“小人”“底于人者”，为人奴颜婢膝，人云亦云，自称为大人却连稚童都不如的人。而李贽对于“大人”“小人”的差异阐述，用意直指当时的现实，批判明朝政府用“德礼”“政刑”禁锢人的思想，束缚人的独立性，从而滋生了人的奴性，导致了人才罕见，寥若晨星的结果，这番言论在壁垒森严的封建社会，可谓石破天惊。

